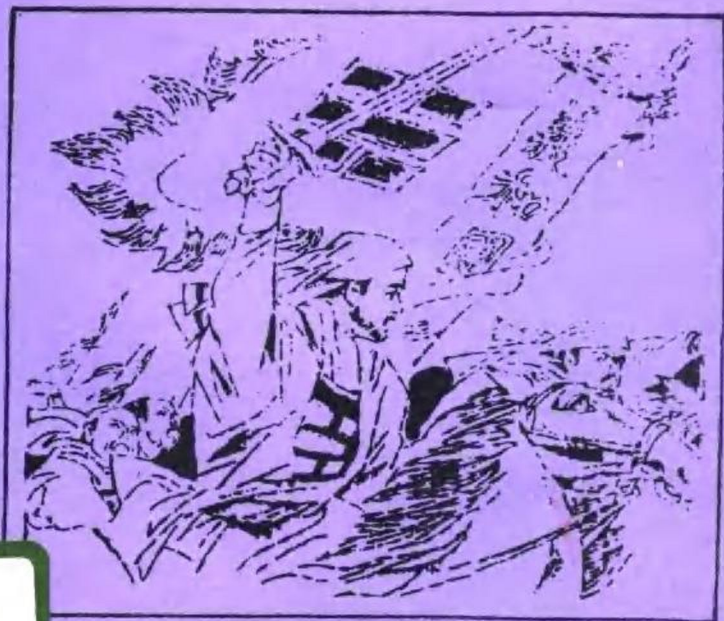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



7
256.7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97
K256.7

2

2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

韩建生 编著

97
K256.7
2
2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

韩建生 编著

目 录

一、义和团运动的时代背景	(1)
二、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3)
三、义和团的组织特色和它的行动纲领	(16)
四、义和团的英勇战斗	(18)
五、义和团和清政府的关系	(32)
六、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原因和历史意义	(40)

C

367863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自发的农民战争,是伟大壮烈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反帝运动阻止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妄想,使中华民族免受完全殖民地的灾难,它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势力,震动了全世界。这次运动的丰功伟绩,值得永远纪念。

一、义和团运动的时代背景

甲午战争(1894年)以后,从世界发展的进程来说,资本主义已经进到了帝国主义阶段。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夺取殖民地,划分势力范围,分割世界的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已经基本结束。在义和团爆发革命之前,1898年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古巴、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虽然直到1902年美国还要保留6万多人的军队镇压菲律宾人民的武装反抗,但它已经有了跳板,可以通过关岛和菲律宾爬上亚洲大陆,特别是中国。当时中国的大门已经被欧洲的一群帝国主义强盗所把守,这个迟到的美国,不得不向英、俄、法、德提出开放中国的门户,使它也能进来掠夺。

英国在1899年10月,派30万军队在南非进行征服布尔人的战争,并于1900年9月压服了布尔人有组织的抵抗。当时在非洲进行侵略的,还有意大利和法国。俄国逼迫清政府在1898年3月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并已经侵入了中国的东北。俄国和日本在中国的东北为争夺土地和利益,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为了对抗日本与英国,俄国和德、法缔结了“远东三角同盟”,英国和日本为了抵制俄国,也缔结了“英日同盟”。这些

国家的目的都是为了在瓜分中国的过程中，捞到最大的好处。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甲午战争以来，腐败的清朝政府已经在一连串丧权辱国的条约中，不断地拱手让出中国的领土和主权。香港、琉球、台湾先后被帝国主义霸占。很多沿海的和沿江的重要城市如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南京、天津、营口等也在“租借”和“开商埠”的名义之下，变成了帝国主义各国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据点。仅在1898年3月到4月1个月期间，中国就丧失了胶州湾、旅顺、大连、威海卫、九龙、广州湾。

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中日“马关条约”规定的赔款数目为2亿两白银，赎回辽东半岛款为3000万两白银。清政府在1895到1899年5年中间，共借用外债7次，总计数目为白银3亿7000万两。经济危机的沉重负担，最终都加到了农民身上。

这些巨额的战争赔款和外债，加上清政府征收的更为繁重的苛捐杂税，以及地主和高利贷的盘剥，农民苦不堪言。

这几年，天灾不断，黄河连年决口，靠近黄河的直隶（今河北省）、山东的很多村庄颗粒无收，其他各地丧失了土地的农民也都变成了流民。

帝国主义的商品倾销，打碎了中国的手工织机和纺车，使城市手工业工人也陷于破产的境地。帝国主义在中国修筑铁路和扩张沿海航运，使得原来从事于水陆运输的工人，特别是运河沿岸的京汉北段的运输工人几乎全部陷于失业的困境。铁路的发展，是各帝国主义国家加紧掠夺中国的标志。英、法、

俄、美等国在他们侵占中国的势力范围内强行修筑铁路，毁坏农田、房屋、铲平农家坟地。遇到农民的反对时，洋人竟开枪射击。

在义和团运动的前夕，中国已经有了资产阶级，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有了自己的组织——兴中会，但力量很弱。康有为、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已经从改良派堕落到保皇主义泥坑。掌握中国政权的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拒绝人民最起码的自由要求、最表面的改良要求以及最形式的立宪要求。

帝国主义的侵略越来越疯狂，中国被瓜分的危机越来越严重，阶级矛盾越来越深刻，而清王朝的统治越来越腐败、保守、反动。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爆发了义和团运动。

二、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以罗马教皇为首的梵蒂冈教廷，向全球各国传播天主教，并领导各地的教会。在传教的过程中，教廷往往借助于强国和它的政治权势，这就无疑地给传教事业带来了复杂性和危险性。

天主教的海外传教工作，主要依靠派往各地的“修会”来进行。所谓“修会”，是由教皇批准建立的组织。修会的传教士经常由一个国家为主。修会的活动经费，一部分来自各国政府，另一部分来自教会的各项收入，包括地租、高利贷、商业收入和捐款收入等等。因此，教会除受教皇的领导外，更重要的是受所在国即经费供应国的政治影响。

鸦片战争以前,天主教修会来山东传教的有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和耶稣会。耶稣会、方济各会都受葡萄牙帝国的保护,通过澳门向山东派遣传教士。多明我会则以西班牙帝国为后盾,通过菲律宾向福建省派遣传教士,再由福建进入山东。由于当时的清政府禁止天主教传播,因此传教在山东停顿了很久。后来法国看到清政府的法令日益松弛,又加紧派教士潜入中国,开展活动。1843年,罗马教皇任命法国传教士为北京教区主教,在华的天主教传教士都受法国的保护。中法黄埔条约签订以后,法国在条约上取得了在中国的传教权。各国和清政府所订的条约中,也都援例同享传教权。于是,天主教各修会在中国的活动,又活跃起来。

德国的圣言会成立不久,1879年就派遣传教士来山东。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耶稣教的各差会才从登州进入到山东各地。从60年代开始,美国的南浸信会、北长老会,英国的浸礼会,圣道公会等等差会,先后来山东传教。70年代又有英国圣公会,美国的美以美会。80年代增加了美国公理会,英国内地会、弟兄会。90年代新到的差会有瑞典浸会,德国的信义会,美国的自立浸会。这些教会的组织遍布山东全省。这时山东省的各种教堂随处可见。法国在茌平大张庄,德国在曹州府都建有大教堂。其他各地如禹城韩庄、恩县庞庄、平阴白云峪,武城十二里庄各教堂都有洋枪洋炮配备的武装组织。耶稣教共有总堂28处,7个教区,乐陵朱家寨的英国教堂,潍县郊区的美国教堂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仅山东1省,就建有大小教堂1000多座,教徒8万多人。当时在中国的洋教士有3300多

人,中国人入教的达 80 多万。这些教士通过宣传宗教,向中国人民灌输忍耐、保守和甘心受苦受难的所谓基督精神,要他们安于被侵略被压迫和受奴役的地位。

这些传教士都是以特殊身分进入中国的,他们都是一身而二用:一方面是宗教团体的宣教师,另一方面又是战胜中国的外国侨民,享有特殊的权力。在清政府所签订的丧权辱国条约中,承认了“领土裁判权”。根据条约中的规定,来到中国的外国公民,不论是商人或者传教士,都一律享有特殊权力。这种权力相当于一国外交使节的特权,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外侨犯罪,由外国领事组织法庭审理,按外国刑律定罪。中外民间的官司,由外国领事与中国官吏共同审理。外国船只和外国人住所,中国官吏无权管辖,如有中国犯人到外籍船或外国人寓所藏匿,中国官吏不能派兵逮捕,只能要求引渡。传教士凡是持有“盖印执照”的,都可以进入内地。还可以在内地购买土地或租赁土地,建造教堂及其他房舍。外国传教士有了这些特权,可以在中国为所欲为,不受中国法律制裁。

另外,在清政府所签订的条约中,允许外国政府保护传教士、教民。中国教民的保护,反而由外国人订在了条约里,这是直接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严重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如果教民的财产受到损失,清政府要把赔款送到传教士手中,由传教士发放。这就等于把中国的教民置于外国的管辖之内。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强权政治之下,清政府在政治地位上不断给传教士以特权。山东的传教士不但在品秩上与清政府官吏分别同级,而且实际上已经得到清政府的官阶。例如 1893 年,清廷赏

给山东南境教区主教安治泰(Anger)三品顶戴,两年后又提升为二品顶戴,并把他列为总督一级。

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颁布命令,规定各地官员,要以礼接待洋教士,还规定主教和教士可以直接向各地官吏平等交涉。这样一来,洋教士便可以随时进出官府,对地方官吏指手划脚。同时,在传教的掩护下,一些外国传教士,配合本国政府进行政治、经济及军事侵略。有的秘密绘制军事地图,有的刺探各种情报,有的霸占田产,收租放债,包揽词讼,敲诈勒索,鱼肉我国人民。加入教会的我国教民,多数是因生活所迫信教受洗,希望能通过入教,改变生活的面貌。但也有一些坏人混进教会,或者外国传教士有意招收一些市井无赖,流氓恶棍,还有一些地主恶霸投靠洋人。这些人一旦入教,就可以为所欲为。犯了法的人,入教可以逃刑,有私仇者,入教可以雪恨。入教不但可以抗拒官府,免除杂税,就是欺压百姓,也没人敢管。这些人是挑起百姓和教民冲突的元凶,他们迎合外国侵略者的意图,甘心充当外国统治者的帮凶和走狗。

传教士的横行,是依仗特权;不法教民的作恶,是依靠教会。这就加剧了他们与普通平民的矛盾。加上中国人民对列强侵略中国的强烈仇恨,西方的传教士受到农村各阶层群众的反对和排斥是很自然的。特别是甲午战争失败后,帝国主义列强妄图瓜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奋起救亡图存,更加切齿地痛恨外国侵略者。德国在山东圣言会的主教安治泰,一直要求德国政府为教会的利益采取行动。他支持德国利用巨野教案强占胶州湾。在民教冲突中,他直接向青岛德国驻军呼吁,要

求派军队干预。德军登陆以后,焚烧村庄,占领县城。后来安治泰在济南和山东当局达成协议,赔银 8 万两,这个教案才了结。除安治泰外,法国教士樊国梁、美国教士丁韪良、李佳白等人,都曾鼓动过瓜分中国,要求其政府动手建立自己的侵略基地。实际上,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租借地、抢占势力范围、瓜分中国的侵略行径,很多都与西方的教会间存在着联系。因此,在甲午战争之后,随着中国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和传教士参加到瓜分中国的斗争之中,中国人民的种种积怨一齐发泄到教会和洋教士以及教民身上。民教冲突实际上是由外国侵略者在中国人民中间制造的悲剧。外国教会的入侵,迫使中国人民反抗,参加反抗洋教的不仅有广大的农民而且包括了部分士绅。部分的官吏因为持同情态度,因而大刀会、义和团等反抗组织以半公开的形式在各地迅速发展起来。

义和团原名义和拳。19 世纪初,山东、河南一带就有了“义和拳”这种秘密组织,从事反清活动。义和拳改为义和团并立起“扶清灭洋”的大旗,大约是在 1898 年夏秋间。当义和团最初出现在山东的时候,它就被清王朝当作社会安宁的仇敌,光绪就曾在 1899 年发布上谕:“著张汝梅加意弹压。”袁世凯也是屠杀义和团的刽子手。

义和拳是从白莲教的一个支派八卦教发展出来的,而白莲教就是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农民的秘密结社,以反抗清朝异族的统治。也有一些秘密结社是以保卫家乡为宗旨的民间武术团体。鸦片战争以后,秘密结社的斗争目标逐渐发生转变。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华侵略的不断加强,尤其是随着西方

教会日益深入到中国农村，民教冲突的日益加剧，农村中这种秘密结社的斗争锋芒，自发地指向了外国教会。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首先兴起于山东。

甲午战争以后，曾遭受日本侵略之苦的山东人民，又深受列强瓜分之害。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以后，把山东视为他们的势力范围，在境内修铁路，开矿石，占田夺地，破坏水道坟墓，教会的势力一天天扩大，给大批农民带来灾难和痛苦。威海卫被日本军队占领达3年之久，后又被英国强迫租借。英国还强行圈占文登、荣城两县，逼迫农民交粮纳税。外国垄断的沿海航运业的发展，又使南北大运河的运输业迅速衰落，原来靠运河为生的船户、挑夫、搬运工人大批失业，到处流浪。此外，从1895年起，山东地区天灾频繁，黄河连年决口，山东50州县受灾。1899年，黄河流域大旱。山东饥荒严重，饥民遍地，随处可见饿死的贫民。农民们逃荒要饭，社会动荡不安。外国的侵略和清政府的暴政，使农民更容易感触到的是外国教士的传教。因此，反教会的义旗一张，便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响应。

山东早期的义和团，除部分是由白莲教的支派八卦教演变来的以外，还有以下几部分构成：山东、直隶交界地区的梅花拳和红拳组织，鲁西南地区的大刀会组织，鲁北地区的神拳组织。

义和团的反帝斗争起于山东冠县十八村。1867年，在法国传教士梁司铎的指使下，冠县梨园屯教民拆毁玉皇庙修建教堂，引起村民不满，激发了“民教”矛盾。这起庙堂之争，“八

起八落”，相持 28 年之久。1895 年，以闫书勤为首的“十八魁”，“拟诉之武力拆毁教堂”。这是一场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的反洋教斗争。

1898 年 10 月，闫书勤联络其他拳民、村民在红拳和梅花拳的基础上，改称义和团。并于当月和赵三多在冠县蒋家庄聚集共 3000 拳民，揭竿起义，首次树起了“助清灭洋”的旗帜。揭开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的序幕，直接地推动了反教会斗争的发展。

蒋家庄起义后，赵三多和闫书勤领导起义队伍首先攻打冠县、临清交界的黑刘村教堂和红桃园教堂，并扩大队伍。接着，义和拳主动东撤至临清、邱县一带，扩充队伍。他们的斗争极大地震动了清政府。清政府命令直隶、山东的清军两路围剿。义和拳斗争受到打击。赵三多率领部分拳民北撤后继续进行小规模的战斗。他们继续进行反教会的斗争。1900 年 8 月 19 日，闫书勤在临清老山头被清政府杀害。赵三多仍然继续坚持斗争。1902 年，赵三多率领余部加入了直隶广宗景廷宾的起义。同年，赵三多被捕牺牲。他率领的队伍，坚持斗争达 5 年之久，是义和团运动中持续斗争时间最长的一支队伍。

当义和团冠县起义后，与冠县邻近的高唐、恩县、茌平、临清、平原一带，反教会的斗争也相继而起。他们受到冠县义和拳的影响，声势日益浩大，在斗争中以朱红灯为首的神拳，成为这一地区反教会斗争的主体，并逐步发展成为全省规模最大的一支反教会队伍，是山东义和团运动的主导力量。

朱红灯，后称朱逢明，山东泗水人，家无亲属。稍有文化，

略懂医术。1898年,朱红灯来到长清县大李庄以卖药行医为业,并拜李开全为师,习拳练武。朱红灯率领的起义队伍,开始称为神拳,1899年10月,在杠子李庄的战斗中,他树起“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的旗帜,将神拳改称为义和拳。他们焚毁教堂,驱逐教士,惩办贪官污吏、恶霸劣绅,多次打败地方团队,又打败清政府派去镇压的军队。他们乘胜攻打恩县的两座教堂。在行军途中,队伍在森罗殿一带遇到清军的三路围攻。朱红灯集中兵力猛烈进攻中路的清军。清军虽然拥用洋枪洋炮,但义和拳人多势众,个个勇猛异常,清军狼狈逃窜。其余两路清军见中路溃败,也不战而逃。朱红灯率领的队伍取得了森罗殿战斗的胜利。此后,山东各地的反教会斗争队伍普遍改称为义和团,山东的义和团运动进一步发展起来。

义和团有严格的纪律。如“勿贪财,勿好色,勿违父母命,勿犯朝廷法。灭洋人,杀赃官。行于市必俯首,不可左右顾。遇同道则合十。”

纪律还规定“不准公报私仇,以富压贫,依强凌弱,以是为非”等等。因此,这时的义和团很得群众欢迎。

义和团在群众中宣称有神拳奇术,能用咒语闭塞洋人的炮火,并能避枪弹。他们把《三国演义》、《封神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书中的人物都奉为神灵当作崇拜的对象。所设的神牌有姜太公、诸葛亮、张天师、关圣、孙悟空等。他们宣传“降神附体”、“刀枪不入”和“画符念咒”的灵验。用这种神秘主义的活动方式,作为激励反抗斗争的精神力量。练功时,由大师兄拈香诵咒,说神来附体了,能避开水火、枪炮。现在看

来，这当然是一种迷信宣传，对于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帝国主义者和清政府，这种宣传当然不起作用，而对于贫苦农民大众来说，可以激励他们斗争的勇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纷纷接受这种宣传，加入到义和团的队伍中来。

山东反教会斗争的日益高涨引起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恐慌。它们多次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清政府坚决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采取有效的措施保护教会和教堂。在列强的干涉下，山东巡抚张汝梅、毓贤先后因镇压不力而被撤调。1899年后期，美国公使康格指名要求派“能干、勇敢”的袁世凯到山东担任巡抚。清政府屈服于列强的压力，任命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年底，袁世凯带着他的几千名新建陆军来到山东。在此之前，毓贤已派参将马金叙用阴谋诡计捉住朱红灯及另一个义和团首领本明和尚。朱红灯被捕后，义和团推举王立言继续领导斗争，并训练马队，势力不断扩展。毓贤在义和团声势浩大的情况下，不敢立即杀害朱红灯和本明。就在毓贤被撤调离任的前两天，他在济南公开杀害了朱红灯和本明，又下令将义和团另一首领邵玉环在兖州斩首。袁世凯的到任，使义和团遭到了更大的苦难。袁世凯对义和团采用剿抚兼施的两手。一方面，他以奖励义和团“献首”、“自新”和立即解散为诱饵，对山东义和团进行分化瓦解；一方面，他派军队严厉镇压义和团，不分首从，格杀勿论。袁世凯刚到任时，正巧肥城县发生一名英国牧师被杀案。袁世凯却谎报平阴、肥城“匪徒”聚众生事，教士被匪徒杀害。清政府下令缉拿凶犯。袁世凯立即捕捉一批民众，将其中两人处死，其余判无期或有期徒刑。袁世凯为

了尽快消灭义和团，他联合驻青岛的德国军队，一齐向义和团发起凶残的攻击。袁世凯命令军队见义和团就开枪打死，还规定，如果发现义和团时不开枪放炮，将领以下一概正法。在袁世凯指挥的新式枪炮的屠杀下，义和团伤亡惨重，首领王立言、王玉振等数十人，先后被袁世凯捕获，处以极刑。就在这时，他也没有忘记要剿抚结合。他有一整套剿抚兼施的策略。在大量印发《义和拳教门源流考》的同时，还仿效曾国藩、罗泽南镇压太平军的“解散歌”，编印各种歌谣，通过官吏、乡绅、塾师乃至组织临时的“宣讲生”，直接向群众进行劝导，诱骗和胁迫他们脱离义和团。他还命令各级地方官，认真整顿民团，清查保甲，让他们报告出参加义和团的群众。并且，他还奖励消除义和团“有功”的官吏和地方民团，处分办事不力者，以官禄诱使他们为解散义和团效劳卖命。对于由纯朴的农民，又基本上是本村本镇利用农闲时间活动，没有统一组织领导的义和团来说，这一套政策，起到了瓦解和分化义和团的作用。这样山东的义和团受到重大的挫折。大批义和团首领被杀害，许多义和团队伍被解散。为数不多的几支坚持斗争的义和团队伍处境极其艰难，山东的义和团反帝斗争暂时转入了低潮。

当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时，与山东毗邻的直隶省反教会斗争也逐步高涨起来。出于反帝斗争的需要，许多群众前往山东学拳，或从山东请来师父教授拳法。也有一些山东拳民主动到直隶铺场设坛，传授拳术。于是，直隶境内的义和团逐渐发展起来。

张德成是直隶新城县白沟河人，船夫出身，往来于独流、

杨柳青、胜芳、王家口、天津等地。1899年在家乡组织义和团时,参加的多是新城和静海县人。1900年他到独流镇建立“天下第一团”,同年6月28日,应直隶总督荣禄之请,率5000余名义和团员进入天津,设坛于北门里小宜门,参加抵抗八国联军、保卫天津的战斗。天津城陷后,返回静海,在王家口被当地封建势力杀害。

以王德成(新城人)为首的另一部,大部分也是新城和文安、霸州一带的农民组成的队伍。

曹福田所领导的队伍,是由天津、静海、沧州、庆云、盐山等地人组成的。北京城里的团民,除城里的满汉民众外,绝大部分是京南各县和京东各县的民众。

到1900年春,直隶义和团发展到中部地区,形成一个以津、京、保(定)三角地带为中心的战斗基地,义和团团民人数达20万人,他们遍布乡野村镇,势如暴风骤雨,发展迅猛。1900年4、5月间,义和团运动在冀中一带发展很快。5月中旬,涞水城东高洛村义和团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反洋教斗争。当时,新城、容城、涿州,易州和房山等地的义和团都应邀前往助战,与前来镇压的清军进行了多次较量,后来这些义和团撤出高洛村,向石亭镇转移。石亭镇位于涞水城北30里。这里群众性的反洋教斗争一直相当激烈。5月下旬,汇集到这里的义和团人数已达万余人。5月21日,清军分统杨福同亲自率领马队前来镇压,义和团初战失利,被捕2人。根据当时敌我斗争的形势,义和团决定在石亭镇附近的两狼沟,对清军进行伏击。

第二天,杨福同率领部队 70 多人来石亭镇继续剿杀义和团。义和团用小部分人和清军交火,且战且退。杨福同不知是计,率领马队向前穷追,一直追过村落深处。当马队进入埋伏圈后,埋伏在两狼沟内的团众突然出击,刀光映日,杀声震天,顷刻之间将马队团团包围,杨福同这时才知是中计,大惊失色,急忙骑马突围。可两狼沟一带沟道纵横,马队施展不出特长。杨福同走投无路,垂死挣扎,开枪扫射。义和团冒死冲入马队,用刀矛和清军搏斗。战斗中,杨福同被刺得体无完肤,最后坠马丧命。在这次战斗中,杨福同全军覆没,义和团取得了全胜。涑水之战对清王朝震动不小,义和团从战斗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士气大振。涑水之战的胜利,鼓舞了附近房山、涿州地区的义和团。他们在首领密熹和尚等率领下,谎称“涿州兵备空虚,洋兵将来,愿意代为守城”,于是一举占据了涿州城。当时进入涿州城的义和团约有万余人。义和团占涿州以后,在城门上高高树起“兴清灭洋”大旗。城上义和团头裹红巾、黄巾,严密巡逻,盘查过往行人。这次占领涿州,大大鼓舞了附近州县的团众。于是,他们也纷纷向涿州聚集。义和团行军的队伍,随处可见。他们举着“替天行道”、“扶清灭洋”的大旗,水陆并进。由于附近州县义和团的汇合,使聚集在涿州城厢内外的团众达二三万人。就连清军驻地高碑店附近,也被义和团占据。

义和团在进据涿州的同时,还在芦保、京津铁路沿线展开了一场拆毁铁路和砍断电线杆的斗争。1900年5月,团众数百人拆毁了芦保铁路线涿州至琉璃河一段铁路 10 余里,同时